

三个人的半个世纪：乱党、逆贼和皇帝

1

1911年中国还姓清的时候，熊秉坤和爱新觉罗·溥仪谁也没见过谁。26岁的熊秉坤在湖北当兵，5岁的溥仪已经在北京当了三年宣统皇帝。

熊秉坤是湖北江夏县人，早年在武昌的码头上当苦力搬运工，后来进入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当兵。在军营里熊秉坤秘密加入了日知会和共进会，投身反清事业。1911年9月，在革命党人召开的起义筹划大会上，熊秉坤的提议被通过：一旦举事，工程营负责占领楚望台军械库。

只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就在起义前夕，共进会的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意外，俄国巡捕前来搜走所有起义文件。事情败露后，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戒严，全城搜捕革命党人。当日晚，起义总指挥部遭到清军突袭，原有起义计划完全告吹。起义骨干彭楚藩、刘复基等人被捕，第二天一早首级就挂到了城楼上示众。

作为第八营代表，熊秉坤知道事态紧急，他召集集中的革命党人，晓以利害陈以大义，最终达成了“暴动者生，延误者死”的共识。熊秉坤又就近联系了左近的其他革命党人，约定当晚以枪发三声为号，枪响即马上开始占领军械库。

但意外再次发生，当晚工程的士兵程正瀛和金兆龙在值班时，被排长陶启胜发现全副武装疑有异动，当场开枪击杀了陶启胜。枪声一响，工程营全营震动。熊秉坤立即下楼吹哨集合队伍，对空连开三枪，开始率部占领楚望台军械库。虽然首先扣动扳机并非出自熊秉坤，但正是因为熊秉坤的当机立断，才打响了武昌起义真正发难的第一枪，此时大约是晚上七时。

当晚八时二十分左右，起义军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后，熊秉坤以总代表兼大队长的名义，向起义革命军发布了第一道作战命令，以湖广总督衙门为进攻目标。在40名敢死队员的进攻下，10月11日黎明时分总督衙门被攻破，武昌落入革命党人手中。

武昌起义一声惊雷，各地纷纷响应，整个清王朝再也止不住油尽灯枯的颓势。5岁的溥仪后来只记得，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



暖阁里，隆裕太后坐在炕上拭泪，地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也是满脸泪痕，整个殿里只有他们三个人，安静无比。

溥仪后来才知道，那老头子是袁世凯，那一次是向清廷提出退位以保全皇族的建议。这是溥仪与袁世凯一生唯一的一次见面。1912年2月12日，溥仪正式退位。

八个月后，27岁的熊秉坤因为武昌起事首功，被民国授予陆军少将军衔。后来他追随孙中山，在国民党成立之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。之后一直在湖北任事，未曾离开。

2

鹿钟麟比熊秉坤还要大一岁。跟熊出身下层不同，鹿钟麟出身于河北望族之家，早年考秀才不中，又因日俄战争而受触动，决定投笔从戎。1906年鹿钟麟只是士兵，1910年已经做到了副官的位置。

熊秉坤起事之后，鹿钟麟也参加了革命党人组织的滦州起义，但起义并未成功。过了几年，鹿钟麟在讨袁的护国战争中迎击蔡锷，但被护国军击溃，鹿钟麟从此改归冯玉祥麾下。随着冯玉祥的势力一步步扩大，鹿钟麟也逐

渐成为其心腹。

1924年10月，在直奉战争中的直系将领冯玉祥突然倒戈，鹿钟麟奉冯玉祥之命突袭北京，很快控制北京全城，鹿钟麟兼任北京警备司令。冯玉祥对至今仍在紫禁城中居住的溥仪并不感冒，早在1917年讨伐张勋之时他就遗憾没有铲除这一复辟的祸根，此时他大权在握，决心立即驱除溥仪出宫。

11月5日上午九点多，溥仪正在储秀宫跟皇后婉容吃水果聊天，内务府大臣突然急匆匆地跑了进来，拿着一份《修正清室优待条件》，说不但必须签字，而且限三小时之内，全部搬出紫禁城。此时紫禁城的守卫已经被鹿钟麟的部队缴了械，而景山上也似乎架起了大炮。

宫内还在开“御前”紧急会议商量对策，鹿钟麟带着20多名军警已经直奔宫内。鹿钟麟把两颗手榴弹往桌子上一丢，看看还在磨蹭的大臣们，故意吩咐手下：“告诉外面，事情还在商量，先不要放炮开火，再等个20分钟。”

鹿钟麟把清朝遗老们吓破了胆。面对如此逼宫，溥仪也是不得不从。下午两点左右，鹿钟麟坐第一辆车，溥仪坐第二辆，五辆

车开出了紫禁城。到了暂居的北府，鹿钟麟走了过来，此时溥仪才跟他第一次见了面。鹿钟麟问：“溥仪先生，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，还是当中华民国的公民？”

溥仪没有料到会有这样明知故问的一幕，他赶紧回答：“当然是做个公民。”

鹿钟麟笑着说：“好，好。既然你愿意做个普通公民，民国政府就会保护你。你要知道，在中华民国里是不允许皇帝存在的，我们有对付皇帝的办法。”

在被熊秉坤的第一枪逼迫退位后，溥仪的皇帝尊号一直得以保留。直到鹿钟麟，才完全将溥仪的皇帝身份变成了一张废纸。这一年，溥仪18岁。

之后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败给蒋介石，鹿钟麟通电下野，蛰居天津。1949年之后鹿留在大陆，在天津义生里街道办工作。后人回忆，他只是个亲和慈祥的老人。

3

退位后的溥仪先到了天津居住，后来又在日本人的唆使下，到长春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。1945年日本投降时，溥仪飞往日本的飞机被苏联红军拦下，溥仪从此被囚禁在苏联数年。1950年8月1日，溥仪和满洲国其他263名战

犯，被苏联移交回国，送往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，接受为期10年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。溥仪从帝王之尊最终沦为阶下之囚，囚犯编号为981。

1959年12月4日，溥仪被特赦予以释放。他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，回到了北京。根据他的意愿，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担任园丁，兼任售票员。1961年3月，溥仪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。

1961年10月，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活动。在政协礼堂第四会议厅内，溥仪在副秘书长申伯纯的陪同下，一进门就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向他伸出了手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快步上前一把握住了鹿钟麟的手，满脸激动。这是溥仪和鹿钟麟，37年后的再度相遇。

鹿钟麟连声说：“奇遇！奇遇！”

溥仪则答道：“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溥仪了。”他大声地补充：“我是新生的溥仪！”

当申伯纯为溥仪介绍到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老人时，溥仪虽然从未谋面，但早已知道这位熊秉坤就是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、让清王朝开始彻底覆灭的起义首功之臣。他激动地表示：“久仰久仰！”

然后三个人一起拍了一张合影。鹿钟麟要溥仪在中间，开玩笑地表示：谁让你做皇上呢？

拍完照片，聊起往事，溥仪问鹿钟麟：你丢在桌子上的炸弹，还有景山上的大炮，都好可怕。鹿钟麟笑道：那是空心弹，景山哪有炮？都是吓你的！溥仪听完，哈哈大笑。老人们谈笑风生，都热烈地庆祝溥仪的新生，室内充满了快活的气氛。

中新社记者徐日琮在新闻稿里写道：“午餐时，大家一起碰了杯。过去，武昌首义的老人们是捏着枪杆子的；鹿钟麟进宫逐溥仪时手里还捏着一颗空心炸弹。今天，大家端起了注满祖国美味葡萄酒的高脚杯，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干了温暖幸福的一杯。”

鹿钟麟死于1966年，熊秉坤死于1969年，他们跟溥仪合影时，辛亥革命过了整整半个世纪。1967年10月17日，溥仪因病不治，中国末代皇帝的谢世，至今也是整整半个世纪。

吴莉莉后来的故事

延安时期，毛泽东曾和美女翻译吴莉莉打得火热，引发贺子珍大闹窑洞，惊动中共高层。此后贺远赴苏联，而吴莉莉则嫁国民党军人张研田，中共建政后随夫去了台湾。张研田曾任台湾农学院院长，台糖董事长、兼职经济部政务次长，对台湾土地改革有杰出贡献，逝于一九八六年。《开放》二〇〇七年第一期刊登署名朱汉生的文章《吴莉莉后来的故事》，揭秘这位最令毛泽东满意的美女被送出延安之后的归宿。

1937年3月底，吴莉莉（右一）给采访毛泽东、朱德的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·利夫(Earl Leaf)担任翻译

我的父亲朱亚英是一个国民党的起义将领，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，判处死刑，缓期执行二年。直到“文革”末期，特赦最后一批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时，才把他释放出来，安排在河北省邢台劳改农场就业，月薪三十二元。后来经过我们子女上诉，找到有关证明人作证，在一九八〇年北京市中级

人民法院重审，认定这是一起错案，恢复了他的起义人员身份，安排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任工作人员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参事，月薪五十六元。

父亲回到北京时，已是一个瞎了一只右眼、半身不遂的七十四岁老人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当时我们一家三口（我和妻子，一个两岁的儿子）挤在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，实在无法容纳父亲。只好把他安顿在北京东郊管庄的一家农户，答应把他的全部工资交给人家，这家人才肯照料这样一个瘫痪的老人。我又用退还给他的没收财产费（折合人民币二千多元），给他买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供他解闷度日。平时我每周骑车从城里到管庄看望他一次，从家里做些他爱吃的饭菜，如饺子、红烧肉、炸酱面等，给他解解馋，再陪他聊聊天，略尽一点子女的心意。

回忆儿时认识的张伯母

一九八〇年十月的一天，我正和父亲一块看电视，一边聊天，他对我述说了一件往事，我终生难忘。

那天正好审判“四人帮”的江青，

江青出场后，态度十分嚣张，桀骜不驯。父亲看了，感叹道：“中国落在这么一个女人手里，老百姓不倒霉才怪。要是换了吴莉莉，中国这段历史可能要重写了。”“爸爸，您说的这话是甚么意思？吴莉莉何许人也？她怎么可能改变中国的历史，这不是胡言乱语吗？”

“还记得你张伯母不？”

“记得，当然记得。她不是妹妹的乾妈吗？小时候，因为她长得美极了，我们都叫她天下第一美人。”

“她是你妈妈的好朋友，你张伯伯又是我的好朋友。所以咱们两家走得很近。你妹妹小时候长得活泼可爱，她特别喜欢，就收下做了乾闺女。你母亲病死后，又是她给我介绍的续弦，也就是你的继母王慧敏。所以你张伯伯和咱们家的关系不一般。”

父亲说的张伯伯就是吴莉莉，毛泽东的情人。

我的眼前马上显现了张伯伯的形象。

张伯伯有着中等偏高的身材，皮肤白皙，有对大而神的眼睛，对人态度冷漠，不大爱说话，她有

一头波浪飘逸的卷发，常常穿着一身将校呢的军装：上身是紧身夹克，下身是马裤，足蹬长统马靴，右手食指上晃荡着一个钥匙链，那是她开的吉普车钥匙。那时在众多身穿旗袍、浓妆艳抹的国民党官太太中，她显得“鹤立鸡群”。当时小汽车还很少见，但张伯伯是胡宗南手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，自然有办法给她弄来车子。

在她的身上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，常使人迷惑，给我的印象很深。比如说，当时我母亲病重，我们家便由王曲搬到了西安，以便就医。那时我才是个小学二、三年级的学生，父亲却把我送到王曲的国民党军官子弟学校中正小学住校，这也是张伯伯所支持的。

她对父亲说：“亚英兄，你放心。星期天就让孩子来我家过，我给他改善生活。”

张伯伯见到我便问：“汉生，学校的生活好不好？吃得怎么样？”

我回答：“一点也不好。吃的是黑面馒头和咸菜，馒头都馊得发酸了；老师动不动就动手打人。”

她一本正经地教训我：“住校就是为了让你从小得到锻炼，能吃

苦耐劳，适应集体生活。一个小孩子不能娇生惯养。”

过了没一会儿，她又问我：“汉生，你没发现我们家里有甚么变化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看看，我们家屋里全都铺上了地砖，这样就干净漂亮多了，小孩子应该培养观察力，你怎么连这么明显的变化都没发现！”

她对我教育很严；自己却追求生活的舒适和讲究（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一般的住房都是土地）。

这就是张伯伯的为人。

思想激进与史沫特莱去延安

父亲开始和我讲起了张伯伯的故事。张伯伯原名叫吴宣晨，也叫吴光伟，吴莉莉是她的艺名。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，张伯伯叫张研田，是她北师大的同学。

后来，她去美国留学，思想激进，认识了海伦·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她回国参加抗日，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。

在延安时期，她在“鲁艺”自编、自导、自排、自演了高尔基的名剧《母亲》，引起了轰动。（未完待续）